

国统区的

文化了文化人

GUOTONGAUDE
WENHUA YU WENHUAREN

重温抗战历史
再现民族精神

朱猷武 王俊芳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国统区的文化与文化人

朱猷武 王俊芳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统区的文化与文化人/朱猷武,王俊芳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ISBN 978-7-201-06042-2

I. 国… II. ①朱…②王… III. 国民党统治区—史料—1938~1945 IV. K26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1053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3,000

定 价:19.80 元

卷首语 不该忘却的记忆

在双手即将挪开键盘的时候，依然心潮起伏……

抗战时期的文化先辈们似乎在我面前浮现，我的耳边似乎听到他们唤醒民族精神的泣血呐喊。面对他们，我禁不住扪心自问：名之为“文化人”的我们，对国家、对民族究竟作出了怎样的努力？或许正是基于此，我们才应当寻求先辈的事迹，从他们为民族的独立和复兴的努力中，探究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形成。也只有这样，当我们瞻仰文化先辈的时候，才不至于汗颜。

——笔者

时光飞逝，若白驹之过隙。似乎就在转眼间，抗战胜利已经60多年了。一甲子是一段不算短的岁月，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已日渐故去，那段历史也渐趋尘封。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那段改变祖国命运的历史，那段中国现代民族意识觉醒和现代民族精神形成的历史，显然比以往要深刻得多、丰富得多。因为人们认识历史犹如旅行者观览名山大川，当旅行者在山间辛苦跋涉时，尽管可以欣赏沿途的奇峰陡壁、茂树丰泉、天险胜景，但往往在走出山脚回头观望时，方能见出它的逶迤姿态、灵气所在。我们之所以提笔写这本小书，部分原因即在于此。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想借此提醒世人：作为华夏子孙，无论时空如何变幻，我们都不能忘记那段历史，不能淡化那场战争给我们的民族带来的一切。因为那是一场决定现代中国命运的战争，它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如何表现那个时代，却让我们颇感踌躇。无数的英烈用鲜血

与汗水铸就了那段历史,留给了我们太多太多。60多年来,人们对那个时代的硝烟烽火、那个时代的英雄高歌、那个时代的可歌可泣、那个时代的悲欢离合恐怕已经有了诸多的了解与感怀,但对身处大后方国统区的文化人这一特殊群体,似乎久为忽略。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文化人手中所握的是笔——这一特殊的武器。尤其令人可敬的是,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国统区文化人没有抱怨、没有退缩,更没有苟且偷生,而是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在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努力呼吁全国民众抗击日本侵略的同时,维系了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并自觉地承担起中国现代民族精神培育的文化使命。这一巨大的精神力量,给整个民族和国家所带来的是民族凝聚力的空前增强和战胜侵略者的无比自信。这种难以估量的独特价值,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愈加彰显。

“文化人”一词,在今天用的不是特别频繁,即使使用,与抗战时期的含义也有了较大的区别,因此有必要对“文化人”这一概念稍加说明。抗战时期,较早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文化界著名人士邹韬奋等人。作为一种在抗战期间出现的且有着丰厚历史内涵的文化现象,当时的“文化人”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特指专门从事文化事业和宣传工作的人士;二是泛指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该词的出现是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关头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再度觉醒的产物,也反映了当时政府和民众对于广大致力于文化抗战的人士的期望与尊重。^①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在那个时期,“文化”这一概念常常用“文艺”来指代,其内容则泛指“精神产品”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活动,从外延上说既包括文化产品,也包括文化活动。

我们尽管无法全景展现那个血与火的时代,但我们将努力探究全面抗战时期(1937—1945)国统区文化人的抗争和努力。在抗

^① 刘辉:《〈文化人〉一词的流行及其历史内涵》, www.booker.com.cn/gb/paper18/7/class001800006/hwz52158.htm - 13k。

日战争中,以现代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民族精神得以形成,而从国统区文化的角度剖析抗日战争,正是为了展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阐释现代民族精神的形成,进而剖析这种精神对当时局势和未来中国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民族精神才是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繁荣富强的强大动力之所在。

目 录

一、抗战时局与文化的使命	(1)
1. 民族危机及抗战文化的产生	(1)
2. 抗战时期文化的使命	(10)
3. 抗战文化的多元格局	(24)
4. 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特点	(33)
二、唤醒民族精神的努力	(41)
1. 国难中的知识分子及知识界的分化	(41)
2. 国民政府的文化纲领与文化政策	(47)
3. 遥相呼应:共产党的文化政策	(53)
4. 文化运动:民族危亡中的泣血呐喊	(64)
5. 民族向心力的空前凝聚	(72)
三、顽强抗争的新闻出版业	(75)
1. 新闻出版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75)
2. 国民党与新闻出版业	(77)
3. 共产党和其他各党派的新闻出版	(81)
4. 主导传媒	(86)
5. 新闻出版中心	(95)
6. 新闻出版业的文化人	(104)
四、为抗战而呐喊的文艺界	(110)
1. 面向大众的抗战文艺	(110)
2. 匕首与投枪:讽刺文学	(118)
3. 诗歌与街头诗运动	(124)
4. 戏剧界的努力	(132)
5. 电影和音乐	(141)

五、文化名流与文艺组织	(148)
1. “赴汤蹈火”的老舍	(148)
2.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152)
3. 胡风与“七月诗派”	(155)
4. 阳翰笙与抗日文艺组织	(159)
5. 南方局	(167)
6. 国统区的外国文化人	(170)
六、现代民族文化的构建	(173)
1. 战时教育及人才培养	(173)
2. 高校内迁	(191)
3. 思想的境界:知识分子的学术努力	(206)
4. 未来“中国之命运”	(222)
5. 构建民族文化与唤醒民族精神	(231)
结语 现代民族精神的形成	(243)
参考文献	(247)

一、抗战时局与文化的使命

1. 民族危机及抗战文化的产生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抗日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独特和极其辉煌的地位,同时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文化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兴起和展开的。所以,要深入了解抗战文化,必须首先回顾那一时代的烽火硝烟。

(1) 日本的侵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非常特殊的时期,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整个国家处于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的浪潮之中。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大片河山为日寇占领,富饶的矿藏为日寇盗取,众多的国人遭到日寇的屠杀。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全面阶段,也就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数月之内,日寇占据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华北、华东、华南烽烟四起。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华北而至华东、华中、华南,致使大半个中国的大好河山沦落敌手。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惨绝人寰:屠杀的惨,奸淫的惨,极尽人世间的惨剧,可谓“罄竹难书”,“令人发指眦裂”。^① 南京大屠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长远看来,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中,更为恶毒和酷烈的,是对中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武力摧残。为了达到长期统治中国的

^① 邹韬奋:《韬奋文集》第1卷,三联出版社1956年版,第250页。



日寇暴行

目的,日本侵略者极力要摧垮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爱
国意识。侵华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说,烧毁闸北几条
街,一年半就可以恢复。而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些中
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在前后长达 14 年的时间里,日军对没有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的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并且每一次都可以说是
毁灭性的。同时,我国许多高等学校、藏书楼等文教单位一起被
列入了日军的攻击目标。这种暴行可从 1937 年 11 月 5 日蔡元
培、张伯苓、胡适、蒋梦麟、罗家伦、刘湛恩、梅贻琦等 102 人联名发
表日本破坏我国教育机关之事实声明中得以具体显示。声明称:
北自北平,南至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本
破坏,大学、专门学校有 23 处,中学、小学则不可胜数!……日人



《新华日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之蓄意破坏,殆即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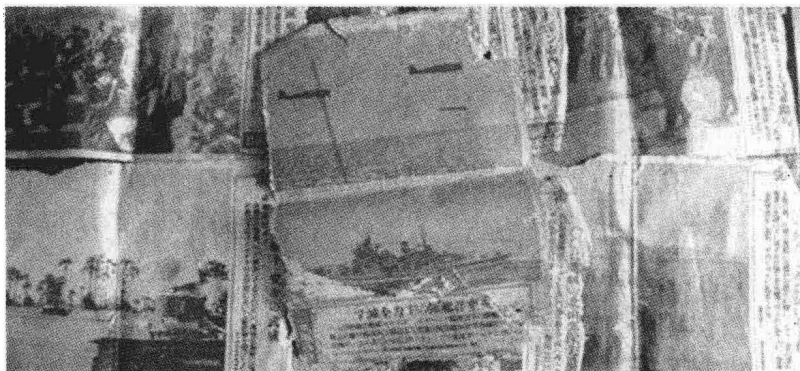
有资料显示,“战时全国各级学校与教育人员所受损失,总额国币 3274819000 元,合美金 966023490 元”^②。不仅如此,日本还屠杀我国进步的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在学校强行推行奴化教育,宣扬日本文化并扶持汉奸文化。日军的所作所为,不仅要摧毁中国文化,更主要的是,企图通过文化侵略削弱我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麻痹我国人民的反抗精神,进而全面征服和称霸中国。

日本侵略者之所以有意识地把文教设施和知识分子列为打击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因为,他们很明白这样的道理:单凭军事力量不足以征服一个民族,要使一个民族完全臣服,那就非彻底消灭其文化不可。并且,“日人认为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知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1页。

② 引自詹永媛:《论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特点》,《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4 国统区的文化与文化人



13份印有《大阪每日写真特报》(昭和十六年)的日文报纸2002年3月11日在济南亮相,这些报纸清楚地记载了1941年日军在印度的一些军事活动识青年均系危险分子”^①。

在对文化人和文化设施进行武力摧残的同时,日寇还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和殖民文化统治。在山西沦陷区内,日本帝国主义竭力宣传“中日同文同种”、“亲仁善邻”、“剿灭共党”、“和平反共”。在奴化教育内容上,日寇废除了抗战爆发前印发的各类教科书,在中小学中把日语定为主课之一,将封建糟粕予以奴化注释,开设“新民主主义课”,大讲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之说,诬蔑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并组织中小学校长赴日参观团,妄图培养一批推行奴化教育的汉奸,以巩固其殖民统治。

在伪满洲国,从1936年起,日伪从教学内容上加强了奴化教育。从1938年1月1日起,实行所谓“新学制”。课程设置和内容有了很大改变。例如,增设日语课。1936年,伪政权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了日语课,颁发了《日语教科书》,从日本招来一些日本人当教师。他们一句汉语也不会,一开始就用日语上课,强逼学生听讲。增设日语课显然是为了奴化中国人的语言文化,培养能

^① 见《1937年以来之中国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169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效劳的顺民和“亡国奴”。

当时,在学校和社会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日本话,不用学(xiáo),再过几年用不着(zháo)。”中国学生还用日语词编出顺口溜,例如“巴格牙路(日语‘混蛋’之意)奇库肖(日语‘畜生’一词之意),你的什么我知道”。伪政权还制定了“日本语语学检定”(日语等级考试)制度,设立特等和一、二、三等四个等级,每年让“国高”应届毕业生和伪官吏等报名参加考试一次,合格者发给等级合格证书。取得日语等级合格证书,就业和升学时候就有优势,那个时代在这里求学的人都有深刻的印象。人们都非常清楚,这样的教育是竭力鼓吹所谓“王道乐土”、“民族协和”、“唯神之道”、“建立东亚新秩序”、“东亚圣战”等等,妄图“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①。

古稀老人何永华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那段接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日子。9月17日,沈阳记者采访了这位72岁的老人,同老人一起回忆了60多年前的“同学互相扇耳光”那段经历。1944年,何永华进入当时的奉天市厚生小学一年级一班,全班共85名同学,他与其他同学一样,对当时的日本校长、日本老师有着深深的恐惧感。校长大野真夫,副校长黑田、徐田都是很严厉的日本人,但当时同学们最害怕的,是体育老师井边八郎。除了体育课外,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井边八郎也总出现在同学们身边。一次,在校长大野真夫主持早晨例会时,何永华所在班级的一个同学笑了一下,井边八郎发现后,让他旁边站着的同学打这个同学的耳光。那名同学不肯,井边又命令另一名同学打这个同学的耳光。就这样,迫不得已,这名同学只好照办。没想到,井边又恶作剧地命令,全班同学站成两排,每两名同学相互打对方耳光。谁要是不肯做,井边就会走上前,不由分说拳打脚踢。同学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45页。

们敢怒不敢言,大家眼含泪水咬着嘴唇,不敢哭出声来,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早已深深埋在心底。^①

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中国和中华民族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峻、最为残酷的民族生存的挑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是以其明治维新以后发展起来的物质力量,动用大量炮火炸弹、先进武器的武装侵略;一方面是扬言其“倭文化”的“先进性”,欲以其“倭文化”灭我中华文明的文化侵略。中国兵民在正面战场和游击战场上所进行的斗争,是以反侵略的武装对付侵略武装的武装抗战;与此同时,广大学人和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在炮火声中艰难地进行着学习和研究,对抗着日寇的文化侵略,以昂扬的精神、坚忍的态度进行着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文化抗战。

(2) 抗战文化应运而生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是一场涉及各个层面的全民族的抗争,不管是在军事领域、还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抑或是文化领域,都经历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在经受考验的时候,中华民族奋起了,全民族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与日寇进行着殊死的搏战。



抗日联军第五军密营

^① <http://www.sydw.com.cn/sywb/2006-09/18/content-23775075.htm>



密林中的抗日联军战士

抗战全面爆发之初,前方抗日将士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后方民众本应踊跃支援前线。然而,客观现实是,民众与军队没能很好的配合。突出的表现为: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而后方的老百姓却非常的冷淡。^①并且,后方民众运动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对此,有识之士们异常担忧。郭沫若就认为这是很危险的现象,他呼吁:“前方的军事行动有军事上的指挥者负责,而后方的民众运动便要靠文化人来多多努力。”陶行知在分析敌后游击战存在问题时也强调:必须把民族教育普及到敌人的后方去。

同时,在前方,我们的抗日将士,除需要物质供应之外,对于精神食粮之要求,尤为殷切。可是前后方的消息经常隔绝,后方所出报刊等精神食粮,不能及时送达前方,以致前方将士数月不知时事。对此状况,沈钧儒等通过前线考察之后特别强调:实在应加紧工作,以增强前线战士抗战之认识,而予以精神之安慰!并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议案,建议由政府号召奖励全国出版业、印刷业、著作人以及文艺团体学术机关等,编印通俗报纸刊物,由

① 《郭沫若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9页。

统一机构输送前方。

随着日军的侵华和全国抗战的深入发展,无论是浴血奋战的前方,还是积极工作热情支前的后方,都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然而,真正被记录下来的,正像郭沫若 1939 年指出的那样,“真是寥若晨星”。社会需要国统区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其优势。

历史呼唤战时文化的出现,应运而生的抗战文化发挥了文化攻势的强大威力,“使国民精神,从深坎中表现出来”^①。文化对抗日战争的影响无需太多的溢美之词就显得如此光华:抗战文化战线密切地配合了军事战线的抗日武装斗争,为全民族抗战的有序进行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抗战岁月中,不屈的中国文化人,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用文化武器与敌人斗争。例如,当日本的侵略迫使福建省会内迁到永安后,新闻界的文化人羊枣和王亚楠等人在日本和国民党的双重压力下,抱着撒播新文化的种子和推动东南文化运动的热情开展进步文化活动。1944 年羊枣从衡阳撤到永安后,像火种似的,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火朝天地出现一片进步文化的生机。他孜孜不倦地工作,创办了《国际时事研究》。还给《改进》、《新福建》、《民主报》等多家报纸杂志撰写政治军事评论文章,并定期给永安各界演讲国内外政治军事局势。他的文章、他的演说,“在风雨如晦、乌烟弥漫的福建省会山城永安,起了很大的澄清作用,仿佛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②。他的努力不仅活跃了福建省的学术气氛,而且为有力打击顽固势力的嚣张气焰和鼓励进步力量的成长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在抗战文化的大力促动下,全民族才

① 《新华日报》1938 年 2 月 25 日。

② 章振乾:《羊枣和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能够齐心协力赢得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达到了空前水平。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在发展之中,不仅是文学、艺术,就连自然科学、教育水平都踏上了一个新的阶梯,并逐步走向世界化。此外,这一时期的文化,还是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载体。两党在抗击日本的同时,也都利用文化作为相互斗争工具,这为抗战文化增添了新的功能,使得抗战文化的发展更为复杂和曲折。

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文化人面临着各个方面的考验,特别是处于日本和国民党双重夹击的地区。东南新闻出版业就面临如此局面。东南出版社仅有三四个工作人员,在如此艰苦和特殊的环境中求发展,需要工作人员具有吃苦耐劳、报效国家的雄才大略。事实也的确如此。该出版社的经理李达仁一人身兼编辑、校对、会计、出纳数职,还要处理邮购书籍的问题,从登记读者通讯处到去邮局取款,再到把一捆捆书送到邮局寄发,无不一一经手,可谓身兼数职。



当年囚禁羊枣的小楼